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博士文库



中间人：流动与交换

——临潭回商群体研究

MIDDLEMAN:
FLOW AND EXCHANGE

敏俊卿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博士文库



中间人：流动与交换

——临潭回商群体研究

MIDDLEMAN:
FLOW AND EXCHANGE

敏俊卿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间人：流动与交换：临潭回商群体研究/敏俊卿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81108-984-4

I. ①中… II. ①敏… III. ①回族-商业史-研究-临潭县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5239 号

中间人：流动与交换——临潭回商群体研究

作 者 敏俊卿
责任编辑 吴 云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8.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984-4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在青藏高原上

日夜辛劳的临潭回商群体

序

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核心是创新能力。虽然不是每个博士都能具备这种素质和激情，但如何使他们向这个目标靠近，则是博士生教育所应担当的责任。1998年5月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是中国高校，特别是被列入“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所努力探索的目标。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属于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心成立后，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相互促进的方针，不断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模式。“博士文库”就是我们为此而搭建的一个学术平台。本中心在“985工程”二期建设过程中先后吸收了150余人参与调研工作，其中一半以上是相关专业的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的参与既保证了这支队伍的专业化和年轻化，有利于成果的创新，同时在科研实践中也提高了自己的专业素质和研究能力。他们所撰写的成果多是对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这正是我们中心的学术定位，即为解决边疆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问题提供借鉴和理论支持。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我们将继续下去，并力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在今天这个以经济发展和技术竞争为主题的时代，急功近利

和功利主义的观念常常使社会科学与人文精神受到忽视。但一些青年博士能够不随波逐流，不赶浪头，致力于被视为“冷门”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毅力、智慧、社会使命感和创新精神。发表他们的作品，也是对“人文精神”的彰显。

民族学、人类学倡导人类不同群体之间要宽容、尊重、公正、理解。这个主张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好的、最优秀的。这既是一种天生的感情，也是一种偏见。当今弥漫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歧视甚至争斗，正是源于这种偏见。偏见往往是由于隔阂造成的。而民族学、人类学就是要打破这种隔阂。它主张这样的道理，就是人类文化虽然形式各异，但都是各民族适应特殊环境而形成并发展的，都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实际价值，因而人们对文化的价值判断都是相对的。不同民族之间，对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应该互相尊重、相互理解、取长补短。认为文化与文化间，民族与民族间，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不仅保持本民族的、自己的美，也应懂得欣赏学习他人的、他民族的美，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从这个角度讲，民族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人类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国在校博士生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然而我们所追求的不该只是数量，更需要质量的提升。为博士生提供创新能力自由发展空间的平台，鼓励他们在实践中独立思考，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有创造力的分析和思考，就是这套“博士文库”的目标。

当然，创新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对

于年轻人来说，在创新中出现的幼稚和缺陷都在所难免。希望我们年轻的博士们不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更加成熟的高度攀升。

丁 宏

2009年2月26日

前 言

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启示我们，人类经济行为的背后隐含着文化、社会的意涵。作为交换物的“商品”不仅满足了人类的现实需求，而且成为不同人群互动的重要媒介，物被赋予了生命和灵魂，不同人群的互惠性交往关系具有社会生命的意义。人类的经济过程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实在的，又是意象的。诚如经济人类学家波朗尼所言，经济“嵌合”（embed）在社会之中。这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多重意义。

在世界经济体系和中国的市场格局中，商业经济是穆斯林经济结构中重要的一极，甚至成为具有群体标识性的经济形式。长期以来，穆斯林充当了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沟通的“中间人”角色。在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阿拉伯商人的活动范围遍及亚、欧、非三大洲。他们开展的大规模商业贸易，不仅建构了庞大的世界经济贸易圈和社会体系，推动了中世纪印度洋地区和地中海地区海上贸易的繁荣与发展，而且在各市场区域文化多样性背景下，促进了文明的流动与对话。生活在“三大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两种经济文化类型（畜牧经济文化和农耕经济文化）”边际或过度地带的回族等穆斯林群体，通过商业活动，推动了不同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建构起跨越地缘、族缘和教缘等多重边界的商业网络，实现了多元文化频繁的互动。然而，商业活动如何与回族的生存、发展、群体认同发生密切的关系，并通过群体互动建立跨越多重边界的关系网络，实现区域社会的完整和完善？本书认为，回族商业经济行为由其重商价值伦理所塑造，受其所处的宏观时代背景和地方性自

然地理、社群结构、权力关系所决定，在一定的社会连带中发生作用，并划定群体内外部的社会边界。

本书选择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农业与牧业经济文化类型过渡和交汇地带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回族商业群体为案例，运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个案研究，试图从小社会实现窥视大社会的可能，即透过社区，了解中国整体社会结构，或了解其社会结构的基层。本书在人类学文化和结构的研究路径中侧重结构的表述。在论述中选取了“中间人”（Middleman）这一核心概念。它不同于以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概念，而具有“道德人”和“社会人”的内涵。它是以经济理性为导引，通过商品的流动与交换，形成和建立多层次的群体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体系的商业人群。

本书分为九章，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临潭回商的发展、变迁的过程，并透过商业活动结成的群体关系网络呈现了回、藏、汉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及意义。从明清时期到当代，临潭回商呈现点状分布和流动相结合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仅联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同层级和区域的市场，而且由于他们与藏族、汉族等多元人群的频繁互动，达成多元文化的对话和社会关系的建构，并实现了自我与外界社会的联结，以及区域社会的完善与成熟。可以说，“中间人”角色的意义不仅通过商品的流动与交换获得各方的利益共赢，而且实现了不同人群的互动，沟通了情感，实现了社会的再生产。在考察回族文化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与汉族文化较高的共享程度，而且更要把握它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密切互动关系。所以，多线脉络和地方性特征构成了回族文化的基本面向。临潭回商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认同就是与诸多群体的多元互动中发展和建构起来的。在这一文化结构中，如果加入回族作为商贸流通“中间人”角色的社会维度时，我们发现，其文化内涵和社会身份构成了互为表里

的互动关系。

经济人类学认为，商业活动建构社会关系，并依附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和发展，二者相互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透过临潭回商与区域性经济、社会体系的互动，使我们注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下，商业贸易在边疆地区多元群体“共生与互补”交往结构生成中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即民族文化、经济类型之间存在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互为脉络的辩证关系。统一性体现了各群体的资源共享关系，多样性呈现了各群体之间的互补背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体现的不仅是各民族在空间构成上的文化多样性面貌，而且深刻地体现了多元群体的互动和依存关系。理论上，传统农耕经济文化圈和游牧经济文化圈是相对独立而不完整的经济和社会区域。他们都必须通过商品的交换和文化的互动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完整与成熟。临潭回族就分布于两大经济文化类型的过渡地带，二者经济文化的互补性需求从客观上为临潭回族创造了投身商业的潜在条件。这告诉我们，决定临潭回族商业实践的动力，不仅是其文化价值系统，而更为重要的是回族和汉族、藏族等群体形成的“共生与互补”机制。“‘共生’既可解释成尊重相互的存在，也可理解为‘你我中互有’的事实；‘互补’则说明生态环境规定了彼此资源禀赋等生活条件都存在各自的缺陷，需要获得对方的补充。‘互补’是依存的原因，‘互补’才能实现共同繁荣”^①。这为我们理解我国多元文化群体关系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启发。

当今社会，尊重文化多样性，将传统的宗教文化资源转化为总体性社会和谐的资源，共建人类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是全球普遍关注的重大命题和追求的目标。同时，在某一道德基础上创造一种社会精神，并维持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是人类的一项

^① 孙振玉主编：《回族社会文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重要任务。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特殊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宗教传统在界定和影响信众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及生活意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为宗教社会群体的集体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伦理道德基础，是塑造宗教群体之间相互协作、和谐共处的文化基础。临潭回商与藏、汉等民族之间商业活动的频繁进行，为多元民族群体的互动创建了平台，商业生计传统与回族群体认同的建构和表达发生了紧密的关联。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图式，文化构成了一群体的信仰、价值观念系统，形成一套规范行为的宇宙观或生活方式。临潭回商对于商业活动意义的认知，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个体生存的现实考量，而且渗透着他们对伊斯兰教信仰的实践和“两世（今世和后世）并重”的生命本质。

商业实践受不同价值伦理的塑造，使得我们在考察群体认同意识的建构和表达时找到了一个最具动态性的有效路径。现实中人群的认同和分类，有着多元的建构和表达系统。临潭回商不仅被外部世界所想象，而且也对外部世界加以想象，形成双向的互动过程。想象的媒介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在“人看我”的过程中，如回商的长相、语言、服饰、生计传统、行为方式、文化观念、宗教仪式等都可能成为与不同文化背景人群互动场景下，他群想象回商的媒介。在“我看人”的过程中，自我群体优化和贬低他群的事实，体现了人类对自我群体凝聚的现实需求和人群之间资源竞争关系及文化观念差异的普遍存在。而基于文化等共享程度差异形成的认同“差序格局”，反映出人群以文化认知从近向远来明确“我群”和“他群”的变动过程。

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群体之间的资源竞争关系并非单纯以物质利益的争夺来呈现，也往往以文化的形式和象征符号进行表达。在藏区以边缘群体或者说以非主体人群出现的临潭回族等民族，在群体的资源竞争中处于弱势和被排挤的地位。但是，我们

应看到，临潭回商对藏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强适应性，以及与汉族文化的共享性，依然具有作为“中间人”的天然优势。然而，他们传统的商业经验必须得到检视，商业经营与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必须得到强化。而对这一处境的理解需要将“中间人”角色置于当前知识经济为先导的社会框架内。就临潭回商而言，置身藏区或转型进入内地，其现代“中间人”角色的发挥必须完成商业与以科技为主导的工业的联姻。我们还必须看到，造成回商“中间人”角色困境的还有民族分层意义上的客观外部环境。由于传统藏族、回族和汉族在职业分化、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民族之间收入、消费上的较大差距。这往往造成民族交往之间的张力，甚至矛盾。当前，我国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需要国家从宏观制度层面予以平衡，而平衡的目标必须通过提高各民族的实际竞争力来实现，而不是单纯地实施以民族为单元的优惠政策。

Foreword

Economic Anthropology tells us that behind human economic behavior is existing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The objects for exchange as “merchandise” is not only to meet the human material needs but also to serve as important interactive media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Materials have been given the life and soul. As a result,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which is based on reciprocity bears social meaning of life. The economic process is not only “natural”, but also of society. It is both real and imagery. As economic anthropologist Polanyi put it, economy is embedded in society. This opinion reveals the profound multiple significances of economy in social life of the humankind.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and Chinese market fabrics, commercial economy is such an important part of Muslim economy that it even becomes a mark of Muslim group in certain areas. Over the past centuries, Muslims have been functioning as a middleman between different areas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At the peak of Arab empire, Arab merchants did their business across Asia, Europe and Africa. Their trading activities created world economic circle and social system thus promoting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eaborne trading in the areas of Indian Ocean and Mediterranean. Furthermore, they strengthen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

tions.

Hui and other Muslim groups who live in the transitional areas of “Three Plateau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rough their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y created commercial network across regions, ethnic groups and religions, thus realizing frequ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diverse cultures.

However, how is it closely related with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group identity of Hui ethnic group, and how does it set 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tworks across multiple borders, thus attain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egional society? This book holds that the commercial behaviors of the Hui is not only shaped by its business ethics but also determined by its historical context and local physical geography,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s. In addition,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the Hui play a rol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involvements and set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boundaries of the group.

Making use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this book conducts a case study by choosing Hui business group in the “old city” area of Lintan county which is regarded as transitional and intersectional zone between two cultural types of pastoral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es because it is located betwee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Loess Plateau.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structure approach in terms of cultural and structural methods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Middleman” as a core concept is selected in the research. “Middleman”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man” who is in pursuit

of maximizing the interests in that the former has a connotation of “moral person” and “societal person”. “Middlemen” hereby refers to a business group who have set up a multi-leve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ystem through the flow and exchange of merchandi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nomical rationality.

The book falls into nine chapters. It displays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Hui Muslim merchants in Lintan county by combining synchronize and chronicle approach. It also reveals two-way interaction and its meaning between Hui, Tibetans and Han by disclosing the network through commercial activities.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rough modern society, Lintan Hui merchants have used their widespread network and mobility to connect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market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areas. More importantly, through frequent interaction with Tibetans and Han People, they generated dialogue of diverse cultures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us connecting themselves with outside world and promoting the regional intergration. As middlemen, Hui Muslim merchants not only created profits for each party through flow and exchange of commodities but also help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emotional attachment. When we inspect Hui culture, not only should we see its commonalities with Han culture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its close interaction with cultures of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One basic dimension of Hui culture is its intra-diversity and regionality.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al identity of Lintan Hui Muslim merchants have been constructed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If we add social dimen-

sion of being middlemen in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to this cultural structure, we will find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Economic anthropology holds that commercial activity constructs social relations and in the meantime it depends on a certain social relations to exist and develop. They influence each other. More importantl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ntan Hui Muslim merchants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we are able to know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of the commerc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borderland. There is co-existence of diversity and un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cultures and economic types. Unity shows that different groups share resources; Diversity tells us that they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The concept "Diverse Cultures under One Political Entity" not only reflects cultural diversity due to geographic factor but also discloses the interactive and 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ic circle and nomadic economic circle are relatively dependent and incomplete economic and social region. They both need commerci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to realize respective completion and maturity. Lintan Hui Muslims live in the transitional area between these two economic types. Interdependence of these two economic types created a potential condition for Lintan Hui Muslims to get involved in commerce. This fact tells us that the motivation of Lintan Hui Muslim merchants does not only exist in their cultural value system. More importantly it derives from the "symbiotic and complementary" mechanism existing among

Hui, Han and Tibetans. “Symbiotic” means respecting co-existence. It can also be explained “each party shares something with another party”. “Complementary” means each party is conducive to the existence of another party. Being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can help realize common property. This find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nderstanding ethnic relations in China.

In modern society, the appreci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cultural resources to social harmonious resourc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world. As a matter of fact, it has already become an objective of the whole world.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human beings to maintain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verse cultures. Religions constitute an integral part of society. Religions have been playing an enormous role in defining social norms values and life meanings. It offers rich ethics for collective life of religion believers. Religions have laid foundation for inter-collabora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Lintan Hui Muslim merchants have created platform for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by doing business with Tibetans and Han People. Commercial livelihood has had a very close connection with ethnic identity of Hui Muslims. Lintan Hui Muslim merchants’ perception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not only reflect their understanding about individual’s survival but also exhibit their belief in Islam and appreciation of both the world and the hereafter.

The book asserts that commercial practice is shaped by values and ethics. This opinion helps us find most dynamic approach when we inspect the constr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